

寻找中国的“茶道四谛”

纯 道

茶道四谛，概述的是茶道精神，它以一种最简明扼要的方式让人铭记。茶道精神可谓是茶道的核心，是茶道的灵魂。确定茶道精神之后，所有的茶事活动就必须根据茶道精神来展开，而一切有悖于茶道精神的行为，都要及时纠正与克服。“茶道”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唐代僧人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①诗句中：“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曾经著有《茶诀》一书，可惜已经失传，但他全力支持陆羽从事茶的研究，成就了世界上第一部茶著作《茶经》。“茶道”一词被日本沿用，是距离皎然近八百年之后的事了。日本室町时期的茶人、被后世称为日本茶道“开山之祖”的村田珠光(1423-1502)，在他的《心之文》首句中写道：“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执己见。嫉妒能者、蔑视新手，皆为不妥。”^②这句话被认定为日本茶道的发轫标志，后来是千利休成为了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日本茶道中将“和敬清寂”奉为“茶道四谛”，如此朗朗上口的四字已经深入日本民众心中，对推行茶道大有裨益。至于为什么是“茶道四谛”，而不是“茶道两谛”或“茶道八谛”呢？或许，“两谛”太少，难以概括茶道的更多核心内涵；“八谛”太多，则不利于记忆与流传。

谛的本义是细察、详审，但在佛教中却意味着谓“真实无谬的道理”，有时以“真谛”、“谛义”来表述。《大毗婆沙论》曰：“实义是谛义、真义、如义、不颠倒义、无虚诳义。”有着礼佛修禅经历的村田珠光和千利休都倾向于用一种传播真谛的方式来告诫自己的国民，茶道精神就在于这“茶道四谛”。用“茶道四谛”表达“茶道精神”，似乎更直接明了，人们只要牢记了四个字，就可以展开阐述与表达对茶道精神的认识。当日本的“茶道四谛”深入人心后，台湾海峡两岸的茶人与朝鲜半岛的两国民众也都在探索与寻找更适合本民族的“茶道四谛”，本文为此将整理分析现有的各家观点，并提出重构中国“茶道四谛”的方式、思路与建议。

一、茶道精神的缘起

对茶道精神的探索由来已久，尽管在表述上各有不同，有称茶道、茶礼、茶规，也有直接称茶道精神的，但最终能够概括清楚的表述，并被广泛接受的字句并不容易。最早出现茶道精神的表述被认为就出现《茶经》之中。

^①《皎然诗集》，中国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3月第1版，卷七。

^②江静、吴玲编著《日本文化丛书·茶道》，杭州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49页。

1、陆羽的“精行俭德”

中国唐代的陆羽在《茶经·一之源》^①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经》出现了第一次关于茶道精神的四个关键字：“精行俭德”。但是，在《茶经》中，陆羽始终没有提及“茶道”两字，更没有“茶道精神”之说。陈文华教授认为：陆羽是以诗人的身份在品茶，皎然是以哲者的身份来论茶，陆羽重茶艺，皎然重茶道。陆羽善于形象思维而追求品茶的艺术性，而着重传经布道的皎然则更善于逻辑思维而侧重于品茶艺术的哲理性。当然，陆羽论述重点是讲饮茶效果，而不是专论茶德^②。尽管如此，如今的茶人还是乐意把“精行俭德”奉为中国的茶道精神，铭记在茶人心中。云南农业大学龙润普洱茶学院就将“上善若水、精行俭德”作为院训，湖州陆羽茶文化博物馆也以“精行俭德”作为茶道精神，镌刻在入口的门楣上。

中国古人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有益通夜不眠、满腹时可帮助消化、不发之物可抑性欲。唐末的刘贞亮提出了“茶有十德说”：“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疴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③但刘贞亮所言的“道”非指茶道本体，而是以茶事传播之“道”。尽管在唐代，中国的先贤已经对茶德进行了概括，但这样的表述显然没有获得完全认可，因此也无法真正流行，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还需要一再定位，来重构“茶道四谛”的“谛义”。

2、日本的“和敬清寂”

从中国唐代开始，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直到中国明代时，才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村田珠光最先提出的“谨敬清寂”思想，深刻影响后世千利休奠定“和敬清寂”的“茶道四谛”。^④不过，有专家认为日本茶道所奉行的“和敬清寂”四字，与南宋时四川籍禅师兰溪道隆所宣扬的茶礼密切相关，这四个字取自中国刘元甫《茶堂清规》，而刘元甫正是在听闻兰溪道隆讲述大慈寺茶礼之后方成此书，其中的“茶道规章”和“四谛义章”两部分被后世编写成《茶道经》，在《茶堂清规》中刘元甫提出了“和、静、清、寂”的清规要求^⑤。千利休（1522-1592）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他明确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反省，彼此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介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

日本茶道从形成伊始，就带有明显的佛教色彩，特别是受到中国禅宗思想影响，将禅与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日本茶道如同一种精神信仰与心灵寄托，被赋予了太多的宗教意味。强

^①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5页。

^②李新玲《从皎然茶诗看皎然与陆羽的关系》：《农业考古》，2004年4期。

^③纯道编著：《禅艺茶道》，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第142页。

^④郑珮萱著：《茶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1月第1版，第4页。

^⑤陈曦《论中日茶文化的“艺”“道”之别》，《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12），第193-194页。

烈的仪式感与神秘的虔诚性交织在一起，再辅以侘寂的审美感与世俗的日常性，让日本茶道中精神层面的东西呼之欲出，欲罢不能。在高度概括化的日本茶道中，“和敬清寂”无疑是最具代表性与普及性的。日本的“茶道四谛”将日本茶道的文化意蕴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美学层面上，茶的神韵，禅的机缘，再加上茶人对人生的感悟，均能够涤荡凡尘，净化心灵，升华情感。

3、韩国的“和敬俭真”

朝鲜半岛与中国国土相连，自古关系密切，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对朝鲜影响很大。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韩国茶礼是以新罗统一初期的高僧元晓大师提出的和静思想为源头，经高丽时期文人思想的发展，在朝鲜李朝时期高僧西山大师、丁若镛、草衣禅师那里得到完整体现。元晓大师的和静思想是韩国茶道精神的根源，它与自然浑然一体：即发叶结果，又回到根上，归于极寂，而寂的根源就是静^①。李奎报把高丽时期的茶道精神归结为清和、清虚和禅茶一味。朝鲜时代的草衣禅师（1786-1866）领悟了禅与茶的玄妙关系，在《东茶颂》中指出“中正”的茶道精神：“既不多余，又不缺少；万人平等，先人后己；追思根源，回归自然。”^②体现了追求中正的茶道精神，认为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人才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与人交往中的生活准则^③。

韩国的茶道精神主要体现在敬、礼、和、静、清、玄、禅、中正等几个方面，其中融合了儒道释的思想，而敬、礼、和、清、中正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最终，韩国提倡的茶礼确定以“和静”为根本精神，其含义则泛指“和敬俭真”。“和”是要求人们心地善良，和平共处，互相尊敬，帮助别人；“敬”是要有正确的礼仪，尊重别人，以礼待人；“俭”是俭朴廉正，提倡生活朴素；“真”是要有真诚的心意，为人正派。不论是日本的“和敬清寂”，还是韩国的“和敬俭真”，都首先强调茶人的道德修养，使其成为本民族茶道的核心。

二、茶道精神在中国

茶道精神，在中国古代以“茶德”论之，且由来以久，陆羽的“精行俭德”就是“茶德”的首创之作，只是让人感觉意犹未尽，很想作进一步的补充完善。当日本人将茶道精神以“和敬清寂”简明扼要地概括成“茶道四谛”之后，这样的形式显然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一些茶人行动起来，寻找起中国的“茶道四谛”。这股寻找中国“茶道四谛”之风，最早从宝岛台湾掀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一批台湾学者和茶人在努力探索中国“茶道四谛”的表述方式，紧接着中国大陆的茶学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据初步统计，目前已经出现了十余种关于中国“茶道四谛”的表述，且有不断增加之势。但是，至今出现的每一种中国“茶道四谛”的表述，

^①《茶道·茶经》，辽海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426页。

^②《茶道·茶经》，辽海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427页。

^③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2期。

似乎都难以完全打动其他中国茶人的心，因而无法形成一种关于中国“茶道四谛”的共识，在分析难以形成共识的原因前，我们可以将一些较有影响的表述作一下梳理。

1、林荆南的“美健性伦”（1982）

林荆南先生是台湾国学教授、最早从事《茶经》译注工作。1982年，林荆南将茶道精神概括为“美健性伦”四字，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称之为“茶道四义”，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①。他强调通过饮茶的艺术实践过程，引导饮茶人完善个人的品德修养，实现人类共同追求和谐、健康、纯洁与安乐的崇高境界。

2、台湾的“清敬怡真”（1984）

台湾中华茶艺协会第二届大会(民国七十三年十二月)通过的茶艺基本精神是“清敬怡真”。协会理事长吴振铎释义为：“清”是指“清洁、清廉、清静、清寂”。茶艺的真谛不仅要求事物外表之清，更需要心境清寂、宁静、明廉、知耻。“敬”是万物之本，敬乃尊重他人，对己谨慎。“怡”是欢乐愉悦。“真”是真理之真，真知之真。

3、范增平的“和俭静洁”（1985）

范增平（1945-）先生是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理事长、台湾明新科技大学教授，于1985年提出中国“茶艺的根本精神，乃在于和俭静洁”^②。他认为茶艺根本精神，就是茶道的精神，也就是茶德。

4、庄晚芳的“廉美和敬”（1989）

庄晚芳（1908-1996）先生是中国著名茶学家、茶树栽培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89年他提出了“中国茶德”设想，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将“中国茶德”概括为“廉美和敬”四字^③。所谓“廉”，就是“廉俭育德”；“美”就是“美真康乐”；“和”就是“和诚处世”；“敬”就是“敬爱为人”。

5、程启坤和姚国坤的“理敬清融”（199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前所长程启坤（1937-）先生和研究员姚国坤（1937-）先生主张中国茶德可用“理敬清融”四字来表述^④。理者，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之意；敬者，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之意；清者，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之意；融者，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之意。

6、张天福的“俭清和静”（1996）

张天福（1910-2017）先生是中国知名茶学家、制茶和审评专家、茶界泰斗。1996年张天福提出“俭清和静”的中国茶礼^⑤，他说：茶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

^①蔡荣章著《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公司，1989年7版，第200页。

^②范增平：“探求茶艺的根本精神”，《台湾茶文化论》，台湾碧山出版公司出版，第43页。

^③庄晚芳：《茶文化浅议》，《文化交流》杂志，1990年2期。

^④程启坤、姚国坤：《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中国茶叶》杂志，1990（6）。

^⑤林杰：《从中国茶礼看俭清和静》，《张天福茶学思想研讨会文集》，2003。

共济；茶致静，宁静致远。他还把四字饮茶礼仪升华到为人处世之道，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提倡的高尚品格和处世哲学。

7、林治的“和静怡真”（1997）

林治（1947-）先生曾任中国高等院校茶文化教材编委会主任，1997年他为茶艺师编了第一套教材，后通过三次全国教材审稿会，把“和静怡真”作为中国茶道的“四谛”写进大学本科教材^①。他认为“和”是中国茶道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茶道的灵魂；“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不二法门；“怡”是中国茶道修习实践中的心灵感受；“真”是中国茶道终极追求。

8、周渝的“正静清圆”（1999）

周渝先生于1981年首创结合生活、艺术和文化的茶艺馆：台湾紫藤庐，他提出“正静清圆”四字可以作为中国茶道精神的代表，也是华夏文化基因^②。“正”指原则与当下，“静”指动静一如，“清指”荡涤身心，“圆”指天地人的互通。

9、净慧法师的“正清和雅”（2005）

2005年10月20日，在河北石家庄举行的“天下赵州禅茶文化交流大会”开幕式上，净慧法师（1933-2013）提出并论述了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他认为，正、清、和、雅四个字，大致可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作为禅与茶相结合而形成的‘禅茶文化’，既有儒家的正气、道家的清气、佛家的和气，更有茶文化本身的雅气。正、清、和、雅的综合，完整地体现了禅茶文化的根本精神。”

10、周国富的“清敬和美”（2012）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先生提出“清敬和美”的茶文化核心理念^③。“清”代表茶之清气、清和、清雅；人之清心、清静、清平；官之清正、清白、清廉。“敬”是人的诚敬、尊敬、敬畏、敬爱之情，是茶之于礼的价值和人行于世的守则。“和”是和合、和谐之义，既是茶道，也是人道和社会运行之道，代表“以和为贵”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本质，也表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自我心灵的宁静和谐。“美”是茶文化当代核心理念追求的最高愿景，是天、地、人、茶、水、情在“天人合一”哲学境界上的共同升华。

在上面十种较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茶道四谛”的表述中，出现了几个高频字，例如：

清，在台湾的“清敬怡真”、程启坤和姚国坤的“理敬清融”、张天福的“俭清和静”、周渝的“正静清圆”、净慧法师的“正清和雅”、周国富的“清敬和美”中共出现了六次；

和，在范增平的“和俭静洁”、庄晚芳的“廉美和敬”、张天福的“俭清和静”、林治的“和静怡真”、净慧法师的“正清和雅”、周国富的“清敬和美”中共出现了六次；

静，在范增平的“和俭静洁”、张天福的“俭清和静”、林治的“和静怡真”、周渝的“正静清圆”、净慧法师的“正清和雅”中共出现了五次；

^①林治：《中国茶道“四谛”》，《福建茶叶》，1999（4），第43-44页。

^②周渝：《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2）。

^③陈野：《清敬和美——构建中华茶文化精神实质的新内涵》，《茶博览》杂志，2012（2）。

敬，在台湾的“清敬怡真”、程启坤和姚国坤的“理敬清融”、周国富的“清敬和美”中共出现了三次；

美，在林荆南的“美健性伦”、庄晚芳的“廉美和敬”、周国富的“清敬和美”中共出现了三次；

俭，在范增平的“和俭静洁”、张天福的“俭清和静”中共出现了两次；

真，在台湾的“清敬怡真”、林治的“和静怡真”中共出现了两次；

怡，在台湾的“清敬怡真”、林治的“和静怡真”中共出现了两次。

在对上述高频字分析中发现，出现较多次数的“和”、“清”、“敬”，显然受到了日本“茶道四谛”的影响，无法体现中国“茶道四谛”的特点。“静”，是中国茶人在寻找“茶道四谛”中出现的另一个高频字，值得作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陆羽提出的“精行俭德”中的“俭”字，在当代中国茶人的探索中也出现了两次。

三、茶道精神的重构

中国出现如此多关于“茶道四谛”的表述，一则表明中国茶人对确立中国“茶道四谛”的重视与认真，另则说明在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权威与共识的“茶道四谛”，在当前茶文化受到广泛关注与倡导的时代背景下，就更迫切需要提出一种重构的思路，以最终确立中国的“茶道四谛”。重构中国“茶道四谛”，应该依照溯源、差别与创新三个原则，以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共识。

1、溯源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201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共收录历代茶书114种，面对如此浩瀚的茶著作，我们需要对其精华作认真探讨与提炼，概括出最能体现中国茶道精神的词句。寻找中国的“茶道四谛”切忌无的放矢，无端生造，否则提出的“茶道四谛”内容就可能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这或许也是如今诸多中国“茶道四谛”缺少权威与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古代学问之人，在给宅院、厅堂、亭阁、著作、子女等取名时，都倾向从古籍中寻找合适的字句，这样的传统甚至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直至今日日本皇族还沿用这一传统。《礼记·儒行》曰：“宽裕者，仁之作也”，日本历代天皇都用仁做通字，如现任天皇明仁，皇太子德仁。德仁女儿敬宫爱子，御称号及名字皆出典于《孟子·离娄章句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因此，寻找中国的“茶道四谛”，应该努力在中国古代茶著作中找到最合适的句子，并提炼出最合适反映中国茶道精神的那四个字。

2、差别

差别，是表示有别于其他类似现象的特征。我们既然要寻找中国的“茶道四谛”，就必须有别于日本的“茶道四谛”和韩国的“茶道四谛”。如果没有差别，就不再需要寻找中国自己的“茶道四谛”了，把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日本“茶道四谛”拿来即可。如果真是这样，日本“茶道四谛”也就成了普遍适用的“茶道四谛”，而今大家依然在努力构建中国的“茶道四谛”，想必需要有自己的民族特征，直接与间接地体现出与日本和韩国“茶道四谛”的不同。在已经有的关于中国“茶道四谛”的表述中，从日本“茶道四谛”中的“和敬清寂”中较多借用了“和”、“敬”、“清”三字，就难以体现中日两国“茶道四谛”在内涵上的根本差别。

3、创新

在差别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本质特征，即中国茶道的个性精神。中国的“茶道四谛”，应该既有溯源传承，也要照顾现实，才能反映现代人的需要与追求，因此在寻找中国“茶道四谛”时必须与时俱进，尽可能发现与挖掘出符合现代中国人精神诉求的内涵。照顾到中国人的现实需求与未来诉求，在提炼中国的“茶道四谛”时必然就会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最终才能寻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茶道四谛”。

四、中国的茶道四谛

根据中国茶道精神的“重构三原则”，本文首次提出以下中国“茶道四谛”，旨在引发更多专家学者的讨论与批评，为最终确立中国“茶道四谛”抛砖引玉。

清：出自唐代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①

俭：出自唐代陆羽《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②

美：出自宋代赵佶《大观茶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及干而研，研细而造，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③

养：出自明代朱权《茶谱》：“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所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④

1、清

皎然是与陆羽同时代的中唐伟大诗僧，在《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诗篇达到470首；皎然还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茶道”概念的人，一句“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奠定了他作

^①《皎然诗集》，中国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3月第1版，卷七。

^②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5页。

^③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27页。

^④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82页。

为茶道祖师的历史地位。皎然曾著有《茶诀》一书，可惜已经失传，但是他是一位注重精神诉求的茶道高人，其地位却不可动摇。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这首诗，不仅为我们贡献了“茶道”这个词，而且首次从茶道精神上进行了描述与分析，“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诗中，皎然写出了一饮、再饮、三饮之后精神和心理上的不同感受，对茶的功效做了热情夸奖。皎然将“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做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这是中唐时期其他僧侣和文人所不可匹敌的。

在三饮之后，皎然直接写出了“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此物是什么？是“茶”，更是“茶道”！“清高”两字就是皎然对此物的最高礼赞，这样的“茶诀”（茶之秘诀），果然如皎然所料，一千多年来“世莫知”。日本的“茶道四谛”中有一谛即为“清”，但与皎然所言并不相同，中国茶人在探索中国的“茶道四谛”时，也有多人提出其中之一为“清”，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人特别表明此谛义语出皎然的诗句。如今，我们正本清源，将“此物清高世莫知”中的“清”，作为中国“茶道四谛”第一义，算是对这位世界“茶道”第一人的告慰，也可以让如今的茶人找到中国茶道的自信心。卢仝在《七碗茶诗》中也四提“清”字：“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①

清者，非浊也。除了皎然提出的“清”之第一解“清高”外，我们还可以从皎然那里获得更多的发现。在皎然《奉和颜使君真卿和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诗中则有“龙池护清澈，虎节到深邃”^②之句，涉及到了饮茶之水的要求，因此“清澈”便是“清”的第二解。《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皎然的“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道出了“清”之第三解“清神”。“清高”、“清澈”、“清神”便是皎然留给后人的重要茶道遗产，如今我们用一个“清”字作为中国“茶道四谛”第一义，应该由“世莫知”变为“世皆知”。

2、俭

陆羽写出世界上第一本茶著作《茶经》，成为茶文化的发轫之作。如今讨论到茶道，无论如何都不会绕开这本开山之作。因此，在寻找“茶道四谛”时，我们同样不能绕开它。好在陆羽在《茶经》的开篇之时，已经涉及到精神领域，《茶经·一之源》中，他这样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①朱世英选注：《茶诗源流》，2011年4月第1版，第17页。

^②《皎然诗集》，中国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3月第1版，卷三。

陆羽说茶最适宜“精行俭德”者饮用，首先，喝茶的人必须是精诚专一，至少喝茶时要静心，做事也应有这样态度，是一个认真的人。其次，喝茶的人要自律，不会给别人增加麻烦，践行自律。第三，喝茶人的品行要简朴，不追求奢华，要低调、内敛和谦逊。第四，喝茶人要淡泊名利，能够守住自己的操行。后人因此有将“精行俭德”作为中国的茶道精神来论述的，卢仝在《七碗茶诗》中也写道：“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在已有的关于“茶道四谛”的表述中，范增平提出的“和俭静洁”和张天福提出的“俭清和静”，都把其中的“俭”字概括在内，庄晚芳的“廉美和敬”中，“廉”也指“廉俭育德”。此外，在韩国的茶道四谛中，也将“俭”字列入其中。

陆羽终生过着俭朴的生活，并以居住在草堂（苕溪草堂）与别业（青塘别业）为乐。陆羽虽没有出家为僧，但他始终同佛门僧侣保持着密切往来。除他曾住过的龙盖寺、妙喜寺之外，他在访茶品泉的生涯中，曾经前往朝拜过的深山古刹达到三四十座之多。陆羽一直过着半是隐士、半是游僧般的艰苦生活。他的这种作派，甚至影响到了日本，村田珠光由此开创了她的草庵茶风。千利休则将“侘寂”美学思想贯彻于茶道之中，由俭而寂，“寂”成为了日本“茶道四谛”中的重要一义。

俭者，非奢也。将陆羽提出的“精行俭德”中的“俭”作为中国“茶道四谛”第二义，还可以赋予更多内涵。“俭”之第一解为“俭朴”，指生活节俭、节省。《韩非子·难二》曰：“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俭”之第二解为“俭貌”，指态度谦逊、俭貌的样子。《大戴礼记·文王官人》：“顺与之弗为喜，非夺之弗为怒，沉静而寡言，多稽而俭貌，曰质静者也。”“俭”之第三解为“俭德”，指俭约的品德。《易·否象传》曰“君子以俭德避难”；诸葛亮《诫子书》云：“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俭朴”、“俭貌”、“俭德”便是茶圣陆羽留给我们的重要茶德思想，如今我们用一个“俭”字作为“茶道四谛”第二义，成为一个追根溯源的象征。

3、美

中国茶道在唐代由皎然与陆羽两位茶道双圣开创，到了宋代更有来自皇家的支持与偏好，尤其是得到了宋徽宗赵佶的厚爱，他因此写了一本《茶论》，因成书于大观年间，史称《大观茶论》。作为帝王的宋徽宗缺少应有的治国能力，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赵佶却是多才多艺，把宋代的美学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茶道方面，他无疑也是第一流的专家，最能说出品茶的个中深蕴。

《大观茶论》写道：“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及干而研，研细而造，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或蒸气如桃仁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讲的是制茶过程与茶香的关系，但后半句是泡茶的过程，显示茶香氤氲的效果。在行文之间，赵佶把“和美具足”看作是茶香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在选茶、蒸茶、压茶、研茶、造茶、入

盞的每一环节都要拿捏到位，细致无误，如此这般的工夫，与如今的日本茶道如出一辙，当然先有宋代点茶，才有日本抹茶，日本抹茶的点茶法就是传承了中国宋代的龙凤团茶的点茶法。

赵佶《大观茶论》中，全文共出现了五处“美”字，论蒸压，他说“茶之美恶，尤系于蒸芽压黄之得失。”论水，他又说“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论品名，他指出：“曾不思茶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论外焙，他又指出：“味虽重而涩乏馨香之美，何所逃乎外焙哉？”^①最终，赵佶提炼出茶之“和美具足”的境界，用一个“美”来代表宋代的美学倾向与宋徽宗的美学追求，似乎是再妥当不过的事了。于是，在唐代茶道双圣为我们贡献了中国“茶道四谛”第一谛“清”与第二谛“俭”之后，宋代的宋徽宗赵佶为我们贡献了中国“茶道四谛”第三谛“美”。如今的中国茶道走向，美学化正是一股主流，在现代人看来，这茶道之美，主要表现在九个方面，即“茶道九美”：茶境之美、茶叶之美、茶汤之美、茶礼之美、茶具之美、茶席之美、茶室之美、茶艺之美和茶人之美。

美者，非丑也。宋徽宗赵佶的“和美具足”境界，同样可以作三种解释。第一解为“美好”，美物可以让人身心舒畅，更好地生活，快乐地生活。《庄子·盗跖》曰：“今长大美好，人见而说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第二解为“美妙”，三国魏刘劭《人物志·八观》曰：“微忽必识，妙也；美妙不昧，疎也。”将“微忽必识、美妙不昧”用在对茶的品味上同样是一个至高的境界。第三解“美德”，《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了五种美德：“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救其菑患，赏其德刑，教其不及。”《论语·尧曰》云：“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用“美”字作中国茶道“第三谛”，也得到了台湾林荆南（“美健性伦”），以及大陆庄晚芳（“廉美和敬”）和周国富（“清敬和美”）的认同。

4、养

在《中国古代茶书集成》收录的114种古代茶书中，明代贡献了57种，刚好占本书可查古茶书的一半。明代自1368年至1644年，此时恰好也是日本茶道的开创时期，千利休生于1522年，而村田珠光则生于1423年，都处于中国明代中期。在明代早期，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1378-1448）著有《茶谱》，是现存明代最早的一本茶书。朱权好学博古，无书不窥，对佛学与老庄深有研究，因此自号涵虚子、丹丘先生等，与皎然的“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的中丹丘相应。《茶谱》继承唐宋茶书传统，开启明代茶书新风，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朱权为此自称为：“崇新改易，自成一家”。

在《茶谱》第一段中，朱权写道：“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把饮茶品茗的最后归结点落在了“修养之道”上，一句“其惟清哉”更与皎然主张的“清”，即本文

^①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24-127页。

阐述的中国“茶道四谛”第一谛相呼应。两度入宋求佛学禅、后来成为日本茶祖的荣西禅师（1141-1215），在对茶道进行学习与研究后，回日本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也把茶的落脚点放在了“养生”之上。

从今时中国茶人饮茶偏好上看，不论是重视禅味一味的“修养之道”，还是偏重延年益寿的“养生之道”，一个“养”字都在现实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它可以成为中国“茶道四谛”的第四谛。最早探讨中国“茶道四谛”的台湾学者林荆南，于1982年提出“美健性伦”，将“性”解释为“养性”，与本文提出的“养”义内涵基本一致。在养性之中，静是关键，“静”是中国茶人在寻找“茶道四谛”中出现的一个高频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包含在“养性”的内涵之中。要让茶具有修养功效与茶道精神，必须先从“养茶”开始。一方面中国人爱茶饮茶，另一方面又担心受到污染，才有了如今中国茶道中“洗茶”环节。中国茶的出口量难以提高，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农药残留偏高的难题一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造成的。要“养茶”，就先要“养地”，更要“养农”，让茶农可以从不良的行为习惯中纠正过来。

养者，非伤也。朱权提出的“修养之道”中的“养”，第一解为“养生”，正如荣西禅师《吃茶养生记》所重视的，茶在调理身体、祛襟涤滞（宋徽宗语）和延年益寿方面已获得科学论证。《庄子·养生主》曰：“得养生焉”。第二解为“养性”、主要指涵养心志、修养善性，破除妄念，让人平静、安住与快乐。《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第三解为“养德”，三国诸葛亮《诫子书》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这一点上与陆羽提出的“精行俭德”有相近之处。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中国“茶道四谛”为“清俭美养”，它们全部从中国古代茶人茶书中获得了溯源依据，四句根本性的语句分别出自唐代皎然与陆羽、宋代宋徽宗赵佶和明代朱权的著作之中，是对中国茶文化历史的一次很好梳理，让中国“茶道四谛”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清俭美养，有理有据，与其他提法全是四个形容词并列关系不同之处，在于三谛归于第四谛，养，与“苦集灭道”四谛的逻辑相应。“苦集灭道”是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佛教各宗共修、必修之法。《法华经·譬喻品》载：“佛昔于波罗捺，初转四谛轮。”苦当知，集当断，灭当证，道当修。同时，“清俭美养”与日本的“和敬清寂”及韩国的“和敬俭真”有着明显的差别，又反映出中国茶人的现实状态与精神追求，因此可以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茶道四谛”：

清之三解：清高、清澈、清神

俭之三解：俭朴、俭貌、俭德

美之三解：美好、美妙、美德

养之三解：养生、养性、养德

“茶道四谛”是一种茶道精神，在古代中国更被视为一种“茶德”，从以上“清俭美养”各字义的解释中可以看到：茶道精神，即茶德始终被置于重要位置上，是中国“茶道四谛”真正的灵魂。

【参考文献】

- 1、[唐]陆羽著 沈科梅编. 茶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2、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G].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
- 3、朱自振著. 中国茶文化史[M].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5.
- 4、贾晋华编. 皎然年谱[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
- 5、纯道编著. 禅艺茶道[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 6、刘勤晋主编. 茶文化化学[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 7、滕军著. 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2.
- 8、[日本]荣西禅师著 施袁喜译注. 吃茶记[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 9、[日本]洋泉社编. 荣西与日本之美[M]. 洋泉社株式会社, 2014.
- 10、[日本]桑田忠亲著 李炜译. 茶道六百年[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 11、江静、吴玲编著. 茶道》[M]. 杭州出版社, 2003年.